「文明免疫力」鴻溝

——基於中美抗擊新冠疫情差異分析之發現

■ 吳承義

黑龍江大學西語學院

摘　要：新冠疫情大流行爆發以來，中美這兩個世界性大國的抗疫行動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中國最早遭遇疫情衝擊，但在世界各國中表現異常突出。而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醫療水平與科學技術優勢明顯，卻遭遇抗疫「滑鐵盧」。中美抗疫的巨大反差背後隱藏著深刻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密碼。基於對中美典型案例的差異性分析，揭示了世界不同特質文明在全球大流行下會呈現不同水平「文明免疫力」的重要命題，並提出當今世界亟需開啟一次深刻的文明新覺醒以消除不同文明間的「免疫力」鴻溝。

關鍵詞：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文明免疫力；中華文明；美國文明

引言

2020年春天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嚴重威脅了人類生命健康安全，對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衝擊，並對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和各國國家治理能力和效力都提出了嚴峻考驗。一年多來，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第一和第三大人口國、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的抗疫行動在全球範圍內格外引人矚目。中國和美國在抗疫理念、模式和成效方面差異明顯，且其背後隱藏著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密碼。當前正值全球疫情久拖不決，對中美這兩個東西方典型世界性大國的抗疫進行全方位差異對比研究，對於重新審視傳染病與人類文明的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的新覺醒都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一、中美抗疫差異巨大

新冠疫情是人類面臨的空前災難，也是各國治理水平和生存能力的「全球統考」。面對新冠疫情這同一張「試卷」，中美兩國在抗疫理念、模式和成效上都形成了巨大反差。

（一）理念模式差異明顯

1.抗疫理念不同

中國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其實質是「以人民為中心」。對人民和生命的態度，是檢驗一個國家文明水平的標尺。疫情爆發後，在生命健康和經濟利益面前，中國選擇了前者，彰顯了人道主義光輝。中國政府以人為本，把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果斷決策，按下了社會和經濟運行暫停鍵，劍指新冠病毒，不惜一切經濟代價，全力救治每一個生命。通過調集全國最優秀的醫生、最先進的設備、最急需的資源投入疫病救治，最大程度提高了檢測率、治癒率，最大程度降低了感染率、病亡率，實行拉網排查，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且救治費用全部由國家承擔，回應的都是人命關天之關切。

美國奉行「資本至上、選舉至上」的理念，其實質是「以資本為中心」。美國在本質上是一個為資本財團服務的國家，民主共和兩黨不過是壟斷

財團的利益代言人，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值自身，創造剩餘價值」[1]。因此在疫情下，美國政府和政要沒有把保護搶救平民百姓的生命當作頭等大事，沒有全力救人，而是全力救市，全力拉選票。全力救市是「資本至上」的直接體現，即一切讓位於資本增值。全力拉選票，直接體現的是「選舉至上」，即通過選舉遊戲決定由誰來代表壟斷資本集團執政以實現資本增值，因此根本上也是「資本至上」。2020年美國的選情與疫情疊加，美國政客醉心於選舉大戰，特別是個別總統候選人，在疫情嚴峻的時候，多次舉行大型選舉集會，反對郵寄投票等等，將個人政治私利置於人民生命之上，對疫情泛濫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相形之下，中美兩國，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為了人民可以犧牲眼前的經濟利益，一個「以資本為中心」，為了經濟利益不惜犧牲數萬乃至數十萬民眾性命，結果造成「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2.抗疫模式不同

中國採取的是「積極總體戰」模式，其要義是價值取向的「積極性」和行動範圍的「總體性」。2020年2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這說明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對疫情高度重視。新冠疫情堪比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一場「世界大戰」，抗疫就是抗戰。概括起來，中國模式核心路徑有三：一是兼顧社會防控與疫苗研發。疫情發生後，中國不惜付出經濟社會停擺的巨大代價，運用古老但有效的隔離辦法，嚴防死守，為疫苗研發爭取寶貴時間，希望最終通過疫苗接種實現「群體免疫」。二是統一行動，全國一盤棋。中國建立統一高效的指揮體系，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令行禁止，構建全民參與的嚴密防控體系，彙集全國之力抗擊疫情，集中社會資源支援抗疫一線，有效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民生，全國人民堅韌奉獻、守望相助，展開一場14億人對陣新冠病毒的人民戰爭。三是積極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中國感念疫情初期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幫助，通過外派醫療團隊、提供抗疫物資，支持世衛組織等方式積極推進國際抗疫合作。中國模式以其積極進取、堅強領導、高效動員、集體行動和國際團結為全球抗疫提供了一個有益範本。

美國採取的則是「消極有限戰」抗疫模式，其關鍵在於價值取向的「消極性」和行動範圍的「有限性」。疫情發生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花了兩個月時間在說大流行與美國無關。特朗普政府和共和黨出於經濟和選舉利益，一直在淡化疫情嚴重性，屢失戰機，導致疫情在全美蔓延失控。美國模式核心路徑也有三：一是過於依賴「科技抗疫」。美國是一個傾向於用科技應對社會災難的國家。較之中國，美國主要是使用疫苗而非封鎖作為抗擊新冠疫情的解決方案。美國對社會防控基本採取放任主義政策，甚至鼓勵人們通過自然感染獲得群體免疫[2]，將終極也是唯一的希望寄托於疫苗接種。二是各自為戰，全國一盤散沙。美國國內始終未就抗疫形成統一共識，提出統一措施，執行統一標準，更難以出現抗疫物資調配之類的統一行動。民主共和兩黨就是否佩戴口罩爭吵不休，國會與白宮就新冠救助立法陷入僵局，聯邦與各州政府圍繞誰擁有「完全權力」、何時啟動緊急狀態、何時重啟經濟等議題相互指責，甚至還哄搶抗疫物資。三是消極對待全球衛生治理與國際抗疫合作。疫情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暫停資助和退出世衛組織；拒絕與中國合作抗疫，並將疫情當作攻擊中國的政治工具；搶奪日德意等國抗疫物資，停止向加拿大出口呼吸機。

（二）行動成效截然不同

疫情發生一年多來，作為當今兩個最有權勢的世界性大國，中美抗疫成效可謂天壤之別。中國最早遭受疫情衝擊，但在抗疫「閉卷」大考中成績優秀，已取得「重大戰略成果」[3]，而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醫療水平與科學技術優勢明顯，卻在抗疫「開卷」考試中遭遇「滑鐵盧」。

1.疫情防控救治效果不同

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成為全球疫情防控的榜樣。疫情初期，由於認識和經驗缺乏等因素，地方政府曾短暫出現應對不當。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從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開始，中國用1個多月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勢頭，用2個月左右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

數以內，用3個月左右取得了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後來又接連打了幾場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殲滅戰，現已進入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並在奮力奪取抗疫鬥爭全面勝利。截至2021年5月29日，中國大陸累計報告確診病例91072例，累計死亡病例4636例，[4]感染率和死亡率均居於世界極低水平行列。

美國深陷疫情泥潭，付出了極其昂貴且不對稱的生命健康代價。在放任主義抗疫政策下，美國一直對疫情沒有足夠重視，行動遲緩，決策失當，最終導致疫情失控，連白宮也被病毒「攻陷」，特朗普夫婦及多名高官感染。自2020年1月3日中方向美方通報疫情開始，一直到特朗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美國錯過了珍貴的70天防控窗口期。美國累計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兩項數據長期高居世界之首。截止2021年5月29日，美國累計確診34022949例，死亡608968例。[5]美國人口感染比例是中國的30倍；美國人口佔全球4%，但其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卻佔全球20%以上，死亡病例總數早已超過二戰、朝戰和越戰三場戰爭美軍陣亡人數總和，並將很快超過南北戰爭這場美國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戰爭的死亡人數。

2.經濟社會恢復水平不同

中國經濟社會恢復平穩且成效顯著。中國政府在優先基本控制住疫情後，迅速調整，統籌兼顧、協調推進，經濟發展穩定轉好，生產生活秩序穩步恢復。推動落實分區分級精準復工復產，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產生活；加大宏觀政策應對力度，落實「六穩」「六保」[6]工作任務，促進新業態發展，推動交通運輸、餐飲商超等各行各業有序恢復；以更大決心和力度推進脫貧攻堅，優先支持貧困勞動力務工就業，防止因疫致貧或返貧。中國2020全年GDP逆勢增長，實際增速2.3%，突破100萬億人民幣[7]，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經濟恢復走在世界前列，顯示了中國強大的修復能力和旺盛的生機活力。

美國陷入嚴重經濟衰退和社會危機。疫情打擊下，美國2020全年GDP萎縮3.5%，是2009年以來首次下跌，創下1946年以來最大跌幅，[8]美國出現2008年金融危機後首次也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目前技術性衰退可能已結束，但美國經濟完全恢復任重道遠。疫情加速了中國經濟反超美國的進程，中國GDP佔美國比重從67%提升至73%，已成為近百年來經濟實力離美國最近的國家。[9]經濟衰退帶來了失業、貧困、種族等社會危機，社會分裂加劇。疫情對美國經濟份額最大的服務業影響最重，失業與貧困現象加劇，而弗洛伊德之死引發「黑命貴運動」，點燃了新一輪種族主義危機。

3.國際形象得失不同

中國鞏固了全球衛生治理大國的形象。面對嚴重疫情，中國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積極履行國際義務，第一時間主動向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通報疫情，發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公布診療與防控方案，開設疫情防控網上知識中心並向所有國家開放，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經驗；在自身疫情防控面臨巨大壓力情況下，盡己所能為國際社會提供援助；倡導共同構建人類

衛生健康共同體，就疫苗使用等議題提出一系列積極主張。儘管部分反華國家和勢力一直在就疫情抹黑中國，但中國依然憑藉豐富有效的抗疫經驗，作為世界工廠和最大防疫物資生產國的製造能力，以及國際人道主義精神與擔當，為全球抗疫貢獻了智慧和力量，贏得了國際社會尊重。

美國全球衛生治理領導者形象不再。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美國本應帶領世界各國共同迎擊疫情挑戰，但特朗普政府頑固奉行「美國優先」，拒絕履行全球領袖責任和義務，拒絕與國際社會分享其醫療、創新研發等優勢和資源，拒絕提出和推動合作議程，拒絕提供健康公共產品，退出世衛組織，罔顧他國權益和感受，保持對多個競爭對手的打壓，甚至對意大利等歐洲盟友也見死不救。美國暴露的自私與無力，引起西方輿論驚呼：「美國不再是一個慷慨的聯盟領導者」[10]，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可能正遭遇「蘇伊士運河時刻」[11]。拜登政府上台後，雖然在全球抗疫合作上有一些「撥亂反正」之舉，但在近期不少國家疫情反彈情況下，拜登政府延續上屆政府「美國優先」政策，堅決拒絕向外國提供疫苗，一味優先照顧本國需求，令世界感到失望。

二、個中原因深刻複雜

過去我們從未有過統一範本來對比中美這兩個東西方大國，而此次全球大流行卻給了世人一個機會，能夠公平審視評價二者。面對同樣的新冠疫情，中美兩國抗疫從理念到模式到成效懸殊如此之大，其背後隱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密碼深刻複雜，令人深思。

（一）不同的政治密碼

中美分別實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兩國在國體、政體、政黨及國家結構形式等方面的制度設計不同，所蘊含的價值追求和路徑依賴不同，這是兩國抗疫差異的深層政治緣由。

1.中國抗疫成功的政治歸因：「人民性」和「大一統」

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具有突出的「人民性」的價值追求和「大一統」的路徑依賴，這對中國抗疫成功產生了積極影響。

首先是體現在中國國體、政體上的「人民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和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下，人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這就決定黨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都是為了人民利益。疫情下，中國政治制度的「人民性」要求中國政府始終將保障民眾生命健康作為抗疫優先目標，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因此，在疫情防控關鍵時刻，中國政府能毅然做出不受資本利潤左右的決定，直接給中國經濟踩上急剎車。

其次是體現在中國政黨制度和國家結構形式上的「大一統」。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其關鍵在於中共是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12]。此次抗疫也不例外。作為抗疫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共表現出了超強的資源整合能力、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和高效的政策執行能力，令世界震撼和欽佩。國家結構形式方面，中國是典型單一制國家，中央對地方具有高度管理權。當地方政府抗疫不力時，中央政府憑藉高效的治理體系及時識別並糾正了問題，同時還高效調配全國各地資源支援武漢重災區，實現了抗疫物資的有效分配。在中國「大一統」政治制度下，各級黨委和政府堅決服從黨中央的指揮，各地區各部門堅決服從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及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指揮，形成全國上下擰成一股繩，14億人像一個人那樣有效戰鬥的良性局面。

2.美國抗疫不力的政治歸因：「資本性」和「分權制衡」

美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具有明顯的「資本性」的價值追求和「分權制衡」的路徑依賴，這對美國抗疫不力產生了消極影響。

首先是體現在美國國體上的「資本性」。在美國資產階級專政國體下，資產階級是國家的真正主人，美國兩黨和政府工作的根本出發點是為了

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當疫情來襲，美國政治制度的「資本性」便要求政府將維護資本的自我增值作為抗疫的優先目標，堅持「資本至上、選舉至上」「以資本為中心」的理念。當資本利潤與民眾福祉發生衝突時，美國政府會堅定地做出資本利潤優先的選擇。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其目的是為資本最大限度增值服務[13]，因此作為資本家代言人的美國政府首先拋出的是數額巨大、名目繁多的救市計劃，而非治病救人的成套措施。

其次是體現在美國政體、政黨制度和國家結構形式上的「分權制衡」。美國政體是「總統共和制」，聯邦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分別由國會、總統、法院掌管，三個部門彼此牽制，以達到權力平衡。政黨制度上，美國是典型兩黨制國家，民主黨與共和黨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國家結構形式上，美國實行聯邦制，在建立統一聯邦政權基礎上，各州仍保有高度自主權。可見，美國政府的「權力蛋糕」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門、民主共和兩大政黨和聯邦各州兩大層級之間被多維度分割。作為分權制衡的消極後果，美國一直無法形成抗疫的國家共識，連佩戴口罩都成為政治鬥爭議題；各州疫情應對各自為戰；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相互指責謾罵，聯邦政府甚至還截留部分州政府的抗疫物資，將醫療物資分配與競選利益進行捆綁，導致疫情嚴重地區無謂出現抗疫物資短缺。

（二）不同的經濟密碼

中國和美國分別實行「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兩國在基礎工業製造能力上也懸殊明顯，這些不同構成中美抗疫差異的經濟注腳。

1.中國抗疫成功的經濟歸因：「公有制為主體」與「第一製造大國」

中國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性質與「第一製造大國」的能力優勢是中國抗疫成功的重要經濟根源。

首先，中國「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性質與抗疫要求相融相通。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主要是指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冠疫情屬於重大公共衛生災害，需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之方式，集中大量社會資源予以應對。在這方面，中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享有獨特優勢。公有制經濟掌握著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和基礎性行業，形成了資源集中的優勢，在重大災害面前政府可迅速調撥大量物質資源用於急需領域，這種巨大的制度優勢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無法比擬的。在抗擊新冠疫情中，中國的國企事業單位和公立醫院發揮著中流砥柱的關鍵性作用：前者承擔著醫療衛生、供水供電等關鍵領域的供給職能，以及疫情期間穩定價格、保證供給、集中援助、平穩市場的重要職能；後者則傾力「逆行」抗疫一線，如全國馳援武漢的4萬餘名醫護人員[14]幾乎都是由公立醫院派出。

其次，中國作為「第一製造大國」的能力優勢提供了物質保障。中國是名副其實、當仁不讓的「世界工廠」。目前中國工業產值佔全世界三成，是美日德三國之和，2020年已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全產業鏈的國家，能夠自主生產從服裝鞋襪到航空航天到工業母機的一切工業產品。此外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已正式跨入世界科技創新型國家行列。中國在此次抗疫中的充足底氣和卓越表現，離不開其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在經歷初期短暫的抗疫物資短缺後，中國迅速發揮其製造業能力優勢，為國內外疫情防控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資保障，如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創造了令全世界側目的「中國速度」「中國效率」；向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資，截至2020年9月6日，總計出口口罩1515億個、防護服14億件、護目鏡2.3億個、呼吸機20.9萬台、檢測試劑盒4.7億人份、紅外測溫儀8014萬件，[15]有力支持了全球疫情防控。

2.美國抗疫不力的經濟歸因：「私有制為基礎」和「產業空心化」

美國經濟制度「私有制為基礎」的基本性質與「產業空心化」的現實困境是美國抗疫不力的重要經濟軟肋。

首先，美國「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性質與抗疫要求相悖相逆。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

家，其經濟制度以私有制為基礎，以自主經營的自由企業為主體，同時輔以國家宏觀調控。面對此次抗疫的需求，美國經濟制度暴露了致命軟肋。在美國經濟制度中，「資本逐利」的天性不受國家權力和公共利益的約束，「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理念被奉為圭臬，這與疫情應對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要求背道而馳。美國經濟由大壟斷資本所控制，國家作為「總資本家」，以服務私人資本利益為宗旨。美國實行高度市場化的醫療體系，抗擊疫情的主體是私有制企業，而私有制企業在生產防疫物資時以實現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與公益性要求格格不入。美國政府更無法大規模調動私立醫院投入抗疫行動，因為私立醫院也以營利為目的，根本不具備公立醫院不惜一切代價為人民健康服務的基因。

其次，美國「產業空心化」削弱了防疫物資的供給能力。二戰後，美國憑藉汽車、鋼鐵、飛機等領域的絕對優勢成為世界製造業霸主。但是資本主義是投資追求利潤的體系，隨著傳統製造業盈利機會逐步減少，大量過剩資本開始尋找新的利潤來源，[16]於是美國將大量過剩產能和過剩資本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進而造成美國本土「產業空心化」——即以傳統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比重快速下降，以金融保險服務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和房地產業比重快速上升，同時新興製造產業的發展又無法彌補這一空缺，進而導致經濟衰落[17]。美國雖然在高科技研發和高精尖製造領域依然領先全球，但總體上不夠重視製造業，特別是中低端產業製造，其後遺症之一便是疫情發生後美國出現口罩、防護服和呼吸機等物資的嚴重短缺。美國在抗疫物資上的尷尬，說明高端科技實力代替不了基礎工業製造能力，也應驗了「金融化往往標誌著資本主義的秋天」這一偉大論斷。[18]

（三）不同的文化密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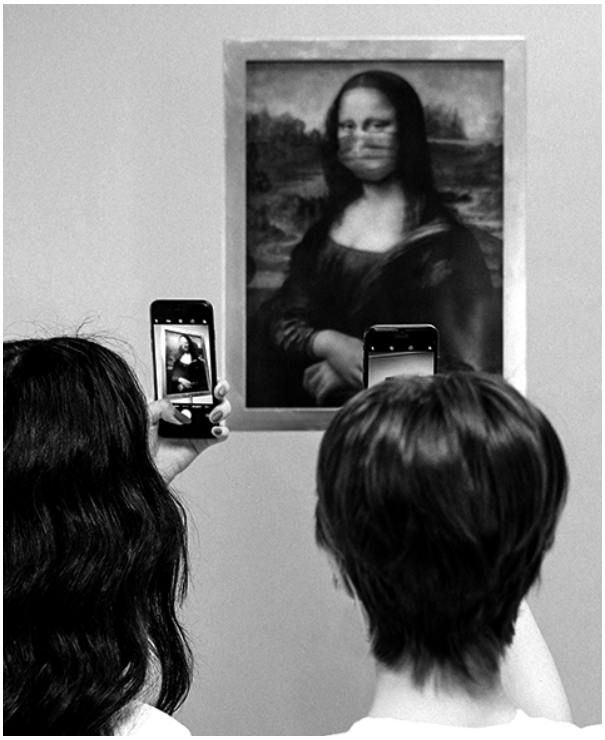
文化決定人的生存和行為方式。在災難情形下，不同民族的人們的認知、心理傾向、習慣動作差異明顯，這其中就有不同民族的不一樣的災難文化在起作用。中美抗疫差異的背後同樣也有兩國不同文化基因的因素。

1.中國抗疫成功的文化歸因：「集體主義」與「仁愛」精神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品格。在這次疫情中，中華文化所崇尚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和「仁愛」精神，是中國抗疫成功的核心文化基因。

首先，「集體主義」價值觀是中國舉國同心進行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的文化引擎。集體主義強調整體利益，同時也重視保障個體利益，二者不可兼得時優先考慮前者。「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等說法就是這種中式辯證集體主義思維的體現。這種強調「甘於犧牲」「患難與共」的集體主義觀念，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解決群體問題、對抗共同風險的歷史中逐步形成的軟實力。中國人素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民眾普遍具有強烈的共同體歸屬感，社會責任意識，國家民族統一意識，以及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自覺意識，這得益於厚重的儒家傳統和悠久的社會建設。新冠疫情下，這些平時可能處於潛伏狀態的集體主義意識得以激活蘇醒，並轉化為全體國民積極參與抗疫鬥爭的偉大動力。中國人民都變成了戰士，各行各業，各條戰線上的人們團結一心，一省包一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普通民眾主動配合，遵守政府防控要求，自覺居家隔離，犧牲個人自由，成就抗疫大局。正如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李晟尹（Sung-Yoon Lee）所言，「儒家強調尊重權威、社會穩定以及國家利益高於個人主義，這在國家陷入危機時是一個改善因素。」[19]

其次，「仁愛」精神是中國堅持人道主義抗疫背後的文化因子。儒家仁愛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深值於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並在關鍵時刻顯現出來。此次中國抗疫就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深厚的「仁愛」精神。中國始終把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從出生僅30多個小時的嬰兒到100多歲的老人，從在華外國留學生到來華外國人員，每一個生命都得到全力護佑，這是儒家重視生命存在與價值的生動體現。家庭中，親人間相互照顧，共渡疫情難關；社會上，醫護人員承受著極大身心壓力，捨小家顧大家，捨生忘死挽救病人生命；國際上，中國在自身防控壓力依然很大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向其他國家提供醫療援助，這些都是儒家



仁者愛人思想傳統的傳承和發揚。此外，在中國疫情防控中，國家救助起到了主體性關鍵作用，國家承擔了全國5.8萬人次確診住院患者的13.5億元醫療費用，[20]充分彰顯了中共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更體現了以仁心行仁政的儒家傳統。

2.美國抗疫不力的文化歸因：「個人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美國文化之根源於歐洲，繼承的是西方文化基因。在這場全球大流行下，美國盛行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傳統，是導致美國抗疫不力的重要文化根源。

其一，「個人主義」價值觀是美國抗疫難以形成合力的文化病灶。個人主義，是以個人為中心的世界觀，強調個人自由和利益至上。美國是一個年輕的移民國家，社會上沒有封建等級之殘餘，立國信條為「不自由毋寧死」，民眾對國家意志抱有高度戒心，極度崇尚個人主義。在個人主義價值觀影響下，疫情中的很多美國民眾不願自我約束，認為「自由高於一切」，政府隔離措施損害了人身自由，嚴重影響就業，因此堅決要求復工復產，部分民眾上街游行，甚至有人持槍闖入州政府。過度強調個體自由與個體利益會導致個體責任感越來越弱。可以說，民眾不配合防疫政策對新冠疫情在全美大範圍傳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個人主義對於防疫的消極作用，在同樣身處美國但深受集體主義影響的亞裔特別是華裔群體新冠感染率很低[21]這一事實反襯中也得到再次驗證。

其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傳統是美國放任弱勢群體淪為疫情「犧牲品」的文化藉口。19世紀興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進化過程同生物進化過程一樣，也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種盲目鼓吹優勝劣汰、極大忽視主觀能動性和社會道德倫理的思潮，對西方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二戰中希特勒的反猶罪行讓人們認識到「人種論」的恐怖，社會達爾文主義開始式微，但並未銷聲匿跡。隨著新冠疫情引發新的生存鬥爭命題，社會達爾文主義沉渣泛起。具體表現，一是對老年人淪為疫情「犧牲品」無動於衷。在美國龐大的死亡病例中，老年人佔到三分之一[22]，但一些奉行「經濟至上」的美國政客還提出「老人應主動為經濟而犧牲」的冷血建議[23]。二是對底層民眾尤其是少數族裔的死活無動於衷。針對疫情初期「富人沒病也能做檢測，窮人有病卻只能等死」的不公平情況，[24]特朗普評論說：「也許這就是人生，有時候是會發生這樣的事。」[25]此外，美國黑人死於新冠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兩倍以上。[26]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看來，老年人、窮人特別是少數族裔是這場生存競爭中的「不適者」，應該自生自滅，這與中國「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

三、關於「文明免疫力」鴻溝的若干哲思

放眼全球，世界各國的疫情應對不盡相同，中美抗疫差異只是其中一對案例，但卻具有相當的標本意義。鑒於國家是文明的載體，是文明社會的概括，[27]若將不同國家抗疫的「國別差異」置於更高的「文明差異」層次進行考察，我們關於傳染病與文明關係的經典討論可能會有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發現—即不同國家和民族背後不同性質的文明，在應對傳染病的能力與效力上存在顯著不同，借用醫學術語，姑且可稱之「文明免疫力」鴻溝。

（一）傳染病與文明的關係史揭示「文明免疫力」鴻溝命題

瑞典病理學家福克·漢森(Folke Henschen)指出，「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28]一方面，傳染病伴隨著人類文明進程而生。目前已知的大部分傳染病，在農耕時代以前的狩獵採集時代並不存在。傳染病始於農業文明，此後人類文明一直在扮演著「傳染病搖籃」的作用[29]。傳染病若在人類社會存留下來，需要有大規模人口聚集為前提條件，而動物馴養往往是造成傳染病爆發的直接誘因。進入農耕文明後，人們越來越多地跟活的動物生活在一起，卻又沒有現代社會那種高水平的公共衛生系統，人畜近距離長時間相處，病毒、細菌等借機傳入人群。那些農業文明延續得最久的地區，最容易成為滋生新的傳染病的發源地。1萬年以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幾次傳染病大流行，基本上都是由動物傳到人身上來的，比如14世紀的「黑死病」和20世紀的艾滋病。另一方面，傳染病也對人類文明進程產生深刻的影響。傳染病對文明的影響之巨，甚至可能超過戰爭，因為它直接打擊了文明的核心和最根本的生產力要素即人類本身[30]。歷史上曾有多次傳染病改變了人類文明進程，如公元前430-427年間的「雅典大瘟疫」造成了四分之一城邦人口死亡，致使古希臘文明開始走向衰落；公元165-180年間發生的「安東尼瘟疫」加速了古羅馬文明的衰落；14世紀奪去歐洲總人口三分之一的「黑死病」催生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歐洲白人殖民者帶去北美的天花等傳染病消滅了印第安文明中90%人口，繼而引起了大規模黑奴販賣。[31]

傳染病與人類文明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的密切關係史，隱約揭示了一個關於「文明免疫力」鴻溝的重要命題，具體有兩層意思：其一，在與傳染病鬥爭過程中，通過征服或實現與傳染病共存，人類文明作為整體得以幸存下來並不斷發展，這說明人類文明面對傳染病是可能具有「免疫力」的。其二，部分文明在此過程中遭遇消亡或衰落的命運，而部分文明則表現出強大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這又說明不同性質的文明在面對傳染病時的確存在著顯著的「文明免疫力」差異。

（二）新冠大流行危機是對「文明免疫力」鴻溝的最新驗證

作為嚴重級別最高的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是一塊靈敏的試金石，可以檢測出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不同性質文明在面對傳染病時所表現出的不同水平的「文明免疫力」。

其一，中華文明在大流行下展示的「文明免疫力」堪稱全球楷模。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是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主權國家完全重合的國家。[32]在近代中國最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激活了古老的中華文明，並使之重新迸發出強大的精神和物質力量。疫情發生後，在中共領導下，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採取「積極總體戰」模式，全國一盤棋，在疫情防控、經濟社會恢復和全球合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示了無與倫比的公共衛生危機管理和應對能力。中國付出的是短期經濟停擺和自由受限的代價，換來的是對生命健康的最大保存和率先走出疫情。中國抗疫成功的奧秘在於綜合發揮制度、工業、文化和科技的優勢與實力，打造了遏制新冠病毒的社會防控屏障和科技終結武器。在遭受新冠病毒攻擊後，中華文明憑藉其使命型政黨政府、緊密型社會、合作型民眾和出色的工業科技，迅速形成了對新冠疫情的系統性「文明免疫力」。可以大膽假設，在全球大流行情形下，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主要文明得以倖存，那一定是飽經苦難後智慧而韌性的中華文明。

其二，美國文明在大流行下表現的「文明免疫力」與其超級大國地位相去甚遠。美國文明是宗教改革後的歐洲文明在北美這片自由土地上的變種，即以英國人為主的移民將自己的文明移植到新大陸，在另一種環境下舊文明演變成了新文明。作為一種特殊文明形態，在人類漫長的文明發展史中，短短不足400年的美國文明形成了一道獨特風景線。美國文明十分年輕，但也許恰因其年輕，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少年得志」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成為獨步天下的唯一超級大國後，美國文明開始步入迷亂彷徨的階段。特別是在新冠疫情衝擊下，美國文明積累的痼疾開始進一步

浮現。美國奉行「以資本為中心」的抗疫理念，採取「消極有限戰」模式，全國一盤散沙，一直沒有形成抗疫合力。儘管隨著疫苗接種推進，目前疫情開始下降，但美國在疫情防控、經濟恢復和全球合作等方面表現卻大跌眼鏡，令人震驚。究其原因，美國文明中政治層面的「資本至上」「分權制衡」，經濟層面的「私有制」「資本金融化」，文化層面的「個人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等制度和觀念是罪魁禍首。較之中國，美國幾乎放棄了社會防控，「押寶」疫苗研發，但目前卻已經付出3000多萬確診、60多萬死亡病例的慘痛生命健康代價。在疫苗接種之前，美國文明因其有限服務型政府、鬆散型社會、自由型民眾和盲目崇拜技術等固有特點，在病毒面前只能任其虐殺，這便是美國文明在「免疫力」上的致命之殤。

囿於篇幅，本文無法對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在大流行下的「文明免疫力」表現逐一討論，但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為，在全球大流行下，中華文明無疑屬於「高免疫力型」文明，而美國文明則可能要歸入「低免疫力型」或「較低免疫力型」文明。作為東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二者差異已足以再次證實在全球大流行下世界不同特質的文明會呈現不同水平的「文明免疫力」這一重要命題。

（三）開啟旨在消除「文明免疫力」鴻溝的文明新覺醒運動

全球範圍內，中國是抗擊疫情的「優等生」，在疫苗研製成功前很早就實現本土病例歸零，目前零星「本土」病例其實都可以追溯到境外。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世界依然在疫情中掙扎，距離勝利遙遙無期，而中國受境外疫情倒灌影響，也遲遲無法宣布抗疫全面勝利。鑒此，站在全人類立場，借助當前新冠大流行之契機，思考如何開啟一場面向「文明免疫力」建設的人類文明新覺醒運動，以消除不同性質文明之間的「文明免疫力」鴻溝，提升人類社會作為政體應對傳染病的能力與效力，可能是當前及未來全球抗疫需要回答的最根本的時代命題。

針對提議中的以「文明免疫力」建設為主題的人類文明新覺醒，中國官方的一些核心倡議或主張可能具有特別的意義。試舉兩例：一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人類是社會性動物，共同體夢想既是情懷追求，更是生存需要。病毒對人類實行無差別攻擊，正如約瑟夫·奈所說，「病毒根本不在乎人的國籍」[33]，這就要求在大流行下全人類具有高度的組織協調性，能像一個擁有免疫系統的有機體一樣，對病毒侵入做出系統性的有效反應與應對，否則就會出現「木桶短板」。這便是中國近年反復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及其衍生倡議—「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內在邏輯。它們初聽上去可能有些「理想主義」，但在新冠大流行背景下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現實迫切性。中國的抗疫實踐也證明，在全球大流行下，單個或部分國家率先實現病例歸零是沒有多大實質意義的，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角落疫情未除，全球抗疫就沒有結束，人類社會就無法真正回歸正常秩序。全球抗疫是一場人類的「集體越野賽」，不是民族國家的「個人爭先賽」，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需要的是協調合作，集體應對，一個都不能少。二是「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主張。中國認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34]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於自己的土壤，都有自己的本色、長處、優點，但是無論在哲學上，還是在實踐中，這裏所說的本色、長處、優點都不是絕對的，比如美國文明中推崇的分權制衡、經濟自由、經濟民主、個人主義、鬆散文化等元素，在平時可能表現為阻止權力濫用、活力、進取、創新、靈活、個人幸福感等優點，但當遭遇大規模瘟疫災難時，其弊端就暴露無餘，可能顯現為協調不力、效率低下、無視公益、責任感缺失、倫理赤字、各自為戰等。這可能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需要向中華文明虛心學習的地方之一。反之亦然，中華文明也絕不能因為新冠疫情應對出色就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虛心學習借鑒其他文明的優秀元素，彌補自身不足，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時宜和情形下的挑戰，真正做到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35]

經過這樣一輪文明新覺醒後，世界各國和民族的文明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民族國家載體之

束縛，逐步接受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共識，變得更有格局，更有協作精神，同時保持開放之姿態，兼容並蓄、交流互鑒，在取長補短中實現共同進步，特別是「文明免疫力」表現較弱的民族和國家，應儘快彌補自身短板，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進程，攜手構建全人類對抗烈性傳染病的公共衛生安全屏障，共同護送人類文明行穩致遠。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

[2]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命的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科學顧問保羅·亞歷山大（Paul Alexander）敦促衛生官員讓「嬰兒、兒童、青少年」和其他非高風險人群接觸新冠病毒，以實現所謂群體免疫。（參見Kristin Wilson, Daniella Diaz and Betsy Klein, Former Trump appointee encouraged herd immunity strategy for Covid-19, internal emails reveal, CNN(Dec. 17, 2020). Available at: https://edition.cnn.com/2020/12/16/politics/trump-administration-herd-immunity/index.html.

[3]新華社：《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年05月23日，第3版。

[4]數據來自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2021年5月30日，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id=0305112e6d104e03a36be251e92cf377.

[5]數據來自百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實時大數據報告」，2021年5月30日，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city=%E7%BE%8E%E5%9B%BD-%E7%BE%8E%E5%9B%BD.

[6]「六穩」是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六保」指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

[7]《2020年我國GDP同比增長2.3%，了不起的正增長》，載《中國經濟周刊》，2021年1月19日，https://finance.ifeng.com/c/839Zdng7NQ2.

[8]《美國2020年GDP增長：-3.5%》，載《環球時報》，2021年1月29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2101291795048478.html.

[9]管清友：《中國要多久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載《第一財經》，2021年1月20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1-01-20/doc-ikftssan8834532.shtml.

[10]Steven Erlanger, Another Virus Victim: The U.S. as a Global Leader in a Time of Crisis, New York Times (Mar. 20,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0/world/europe/trump-leadership-coronavirus-united-states.html.

[11]Kurt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 1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12]《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編寫組：《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頁。

[13]徐士兵：《資本家範疇新探》，載《理論觀察》第94卷第4期，2014年4月，第5頁。

[14]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載《新華網》，2020年9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08/c_1126467958.htm。

[15]《抗疫鬥爭偉大實踐彰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擔當》，載《中新網》，2020年9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9-11/9288649.shtml。

[16]胡瑩：《新自由主義背景下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及其影響》，載《求實》第388卷第8期，2013年8月，第73頁。

[17]任淨、周帥：《美國產業空心化問題研究》，載《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5期，2015年10月，第6頁。

[18]按照阿瑞基的理論，當一個霸權國家從實物擴張過渡到金融擴張時，這個國家也就開始悄然走向衰落，因此金融擴張一般預示著資本主義霸權國家「秋天的到來」（參見傑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二十世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19]East vs. West: Coronavirus Fight Tests Divergent Strategies, Tufts University website (Mar. 13, 2020). Available at: https://fletcher.tufts.edu/news-events/news/east-vs-west-coronavirus-fight-tests-divergent-strategies.

[20]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載《新華社》，2020年6月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6/07/c_1126083364.htm。

[21]《美國華人染病率低於其他族裔美專家：與這些特有習慣有關》，載《海外網》，2020年5月19日，http://news.haiwainet.cn/n/2020/0519/c3541093-31793738.html。

[22]徐劍梅、鄧仙來：《美國新冠死亡病例約三分之一來自老年人護理機構》，《新浪科技》，2020年5月10日，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5-10/doc-iircuyvi2367204.shtml。

[23]李威：《反思西方疫情背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載《澎湃新聞》，2020年10月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446394。

[24]美國《紐約郵報》2020年3月28日評論道，「如果你既有錢又有名，那麼你更有可能獲得測試。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那麼，祝你好運」。（參見Dana Kennedy, Rich and famous get COVID-19 test but average, New York Post (Mar.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nypost.com/2020/03/28/rich-and-famous-get-covid-19-test-but-average-people-cant/.）

[25]Trump says 'perhaps that's been the story of life' about famous people getting coronavirus tests while very few others can, Associated Press (Mar. 19,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professional-athletes-and-celebrities-get-coronavirus-tests-raising-inequality-concerns-2020-03-19.

[26]Scottie Andrew：《美國黑人死於新冠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兩倍以上》，清研智庫編寫：《清研智庫系列研究報告》（2020年第4期）（北京：清研靈智信息諮詢（北京）有限公司），第1頁。

[2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頁。

[28]李建中：《世紀大疫情》（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第1頁。

[29]《〈傳染病與文明〉作者：人類應學會與傳染病「共存」》，載《參考消息網》，2020年3月17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ulture/20200317/2404874.shtml。

[30]龍希成：《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傳染病：肆虐與征服》，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4月17日，第T00版。

[31]同上。

[32]張維為：《文明型國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33]《約瑟夫·奈談全球抗疫：中國已表現出強大的耐力，美國政府仍步履蹣跚》，《搜狐網》，2020年4月28日，https://www.sohu.com/a/391699182_162522。

[34]伍剛：《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將於2019年5月1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載《央廣網》，2019年5月9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514/c164113-31082994.html。

[35]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會學家中根千枝教授和喬健教授在東京召開「東亞社會研究國際研討會」，為費孝通80華誕賀壽。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主題進行演講時，費老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

The Civilization Immunity Gap: A Find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and America's Fighting COVID-19

Wu Chengy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anti-epidemic actions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world power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worldwide attention. China was the first to suffer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but its performance was extremely outstanding among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 number one power,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medical treatmen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it has encountered, Waterloo, in its response to COVID-19. Deep and complex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des are hidden behind the huge contra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ses, this paper reveal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that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show different levels of, civilization immunity, under the global pandemic, and highlights the urgency to start a campaign for new profound civilization awakening in today's world to bridge the immunity, gap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Civilization Immunity, Chinese Civilization, American Civilization